



## 告别“伪勤奋”

□ 洞见

01

前几天跟一个学长交流,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刚毕业那年,他和一个同学一起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实习。为了给老板留下好印象,他每天第一个到公司,最后一个离开。实习期间,他几乎每天加班到12点。而他的那位同学,每天掐着点来,又掐着点走。两个月后,公司考核转正,他本来以为自己稳了。结果,他没能转正,而他的同学却成功留在了那家公司。

他很气愤,发了一条朋友圈吐槽:“60天的勤奋努力,不过是个笑话!”所在部门的领导看到后,发给了他两份业务报告,一份是他的,一份是那位同学的。

他的那份报告,密密麻麻几千字,内容中规中矩。与之相比,另一份报告,虽只有千余字,但逻辑清晰,重点突出,让人一目了然。最重要的是,在战略分析那一栏,他只草草提了一句,而他的同学却浓墨重彩,深入浅出地指出了公司的优势劣势以及市场中潜藏的机会与风险。原来,在他为琐事忙到脚不沾地的时候,他的同

学已经把策略层面的问题研究透彻了。

豆瓣上,有个叫“杀死伪勤奋”的小组,里面有这样一句特别扎心的话:“机械式努力的背后,不过是一种肌肉的习惯性运动。这看起来是勤奋,其实是脑子的偷懒。”

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,不是努力的程度,而是思维的深度。没有深度思考,所有勤奋都是白搭。就像我的那位学长,他被自己表面的努力麻痹,将勤奋肤浅地理解为“每天工作到12点”,而忽略了思维的精进。直到最后才发现,自己不过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,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

02

“麦克阿瑟天才奖”获得者塞德希尔·穆来纳森有句名言:“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,留一定的余闲很重要,它不是对资源的浪费,而是让系统更加高效地运转。”

同样地,对于个体而言,我们也需要给自己留下一定的余闲时间,来思考充电,升维自己。

作家李尚龙曾在新东方当老师。在那里工作的最后一年,他向排课的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:周末晚上不上课。

有同事劝他:“这样你一个月少赚四五千块呢!”

他咬了咬牙,但还是说:“别排了吧。”之后,每个周末的晚上,在其他同事忙忙碌碌赶去公司上课挣钱的时候,他却待在家里读书、看电影、写读书笔记,思考自己的个人价值和人生方向。

结果现在,教培行业没落,他的同事们,要么无奈失业,要么被迫转行。而他,已经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,年入百万。

一个人的思考深度,决定了他人生的高度。就像李尚龙,他没有和他的同事一样,日日在工作的旋涡里打转儿,一味穷忙。相反,他把自己从忙碌的生活中剥离出来,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,不断找寻新的人生路。

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《随想录》里写道:“人只是一根芦苇,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,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。”

我思故我在。

人,唯有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间,才能静听灵魂深处的声音,才能找到人生最有价值的路径。

——摘自《重庆晨报》

点滴

## 守得寂寞

□ 李大钊

近来常听人说:“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。”我想这“寂寞日子”,并不是苦境,实是一种乐境。

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,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。譬如天时,一年有一个冬季,是一年的寂寞日子。在此时间,万木枯黄,气象凋落,死寂冷静,都是它的特色。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,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吗?

一天有一个暗夜,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。在此时间,万种的尘嚣嘈杂,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。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,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吗?热闹中所含的,都是消沉,都是散灭;黑暗寂寞中所含的,都是发生,都是创造,都是光明。

——摘自《新世纪文学选刊》

## 不以己善示人

□ 蔡志忠

有一个江洋大盗走到圣人面前跪下,痛哭失声地说:“我十恶不赦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圣人回答说。

“我作恶多端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杀人无数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江洋大盗突然大笑狂奔,跑了很远很远,然后回头向圣人大喊:“我放下屠刀,改过自新啦!”

圣人高声地回答说:“我也是!”

——摘自《文苑》



## 口罩后面藏着不能说的秘密

□ 常迎春

我常去星巴克办公。去得多了,慢慢记住了几个店员的面孔。

店员里有个女孩子,眼睛细长,身形瘦削,常在柜台后面忙碌,冲咖啡,收拾台面,麻利沉默,静水流深。

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——可能也说过,让她给我续过热水?或者端咖啡时向她道过谢?只是,我从没留意过她的反应,也没注意到她有什么与众不同,仅仅发现她常常面无表情。

今天,我又来到星巴克。吃完甜点,喝完咖啡,我去续水,走到前台,看到她正在给咖啡打包。

我说:“麻烦给我倒点热水。”

我的声音不大,但是已足够传入她的耳朵。她背对着我,没有转身,也没有答话。

我以为她没听到,抑或听到了一时走不开,便在台边等了片刻,看她云也似的忙活。

她飞快地打包好两袋咖啡,一大一小,拎着转过身,这才仿佛突然看到我,立刻放下手中的纸袋,迎上来,一手接过我的咖啡杯,一手按向水龙头准备接热水。

我向她随意问了句:“你们今天几点关门?”

她却恍然受了惊,脸上滑过一抹莫可名状的表情,随即放下接热水的杯子,双手飞舞着开始比画。

我这才惊觉:她是位聋哑人!

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意中撞破了一个秘密,一时间有点慌乱和尴尬,也自觉有点唐突。

我不懂手语,看不明白她比画的是什么,于是满脸歉意地指指旁边,说:“我去问问其他人吧。”

但女孩子已经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电子手写板,取下手写笔,递到了我手上。

我没看清她从哪儿拿来的工具,愣了一下,这才欣然接过,写下我的问题。

我把手写板递还给她。她收回去仔细看了看,伸出右手,注视着我的眼睛,在空中重重地画了一横又一折,喉咙里发出细微而嘶哑的一声呻吟。

我点点头:“7点,好的,谢谢。”她也点点头,把我的杯子再次放到水龙头下,注满水,双手捧着。

我接过水,一边盖盖子,一边再次点头道谢。她也点头,眼睛带着笑意。

回到座位上,我心里鼓鼓的,有种难以名状的情愫在胸腔膨胀。

平时,我很少关注残障人士,也不常看到他们的身影,仅仅通过媒体得知,他们其实为数不少,离我们也不远,却很少走入人群,在阳光下漫步。

我有点难以想象这个女孩子为藏身人海,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我也多少有点好奇,其他客人知道她的情况吗?直到星巴克快打烊的时候,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6点55分,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路过前台,我看到只有她一个人在值班。

一个男子迈进门店,走到柜台前说要点单。女孩子一边冲他点头,示意他稍等,一边不慌不忙地走到工作间门口开始敲门。

原来,她有值得信赖的伙伴可求助!

她没有再打手语,也没有再掏出手写板跟人交流。除了我,没人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,也没人发现她口罩后面,藏着不能说的秘密。

——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

## 为什么理发

## 变成了件痛苦的事

□ 照月

社会

我的头发天生自然卷,还是油性发质,留长了不方便打理。加上多年来对学生发型的严格管控,让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时尚潮流——我已经想不到什么发型适合自己了。每次去理发店,我不会提太多要求,只想让理发师傅把头发剪短一些,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

可同样是剪短发,所需的开销一年比一年贵,体验也一年比一年痛苦,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痛苦。物价在涨,房租在涨,理发费用会跟着涨,这我理解;我碰到的理发师傅,服务也没有不周到的地方,要我说,更有可能跟我心境的变化有关系。

升入中学前,我家楼下只有一家理发店,男女老少剪头一律3元。后来这家理发店倒闭了,紧接着许多家“发廊”“发艺”冒了出来,每一家都有杀马特发型的老板和师傅,他们异口同声地把报价抬到10元。价格贵了,但那时的理发店回忆起码是轻松加愉快的——我只是个毫无敬畏之心的小屁孩,“社交恐惧”这个词还与我压根不沾边。理发师傅不会拿生活琐事或者理什么发型之类的问题烦我;跟老板混熟了,我甚至敢在老板的办公电脑上玩游戏。

上中学后,理发店与理发师傅又换了一茬,懂游戏的老板不知去向。此时的理发价格涨到15元,办卡与会员制度也来到我家楼下,其中一家店买10次赠5次,我们一家五口办了一张卡轮着用。

这一阶段的理发体验就很难让我放松下来了。每次坐在椅子上,理发师都要没话找话。他们的问题永远与学业相关,作业、考试、老师,就像远房亲戚一样。在洗剪吹的一整套工序完成前,我必须直面这些令人烦躁和焦虑的问题,即便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,放松的思绪也早已被打乱。

到了大学与大城市,则是另一番境况,想在理发店唠家常,也没人愿意跟我聊了。校园内部的理发店收费20元起步暂且不论,理发师日接上百名学生,无不化身为不近人情的“理发机器”,只负责理发,只理他们自认为好看的发型,必须在我执意坚持下,他们才不情愿地拿起电动推剪推平我的头发。

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,我彻底失去了理发的权利。去年上半年疫情封校,一封就是五个月,理发师傅进不来,家属区还围了栅栏加了门禁,整个学校找不到可以理发的地方。

好在除了毕业论文和上网课补学分,我的睡眠还算充足;给一层楼用的集体浴室成了我的单间,洗头也方便。到了六月,我已披头散发,第一个回到同楼层的朋友,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来了。

直至搬出学校来住,我才见到了久违的理发师傅,但他们的要价又涨了,去年还是40元起,今年就有奔向50元的趋势。货比三家后我发现,最便宜的理发店在一公里以外,办张卡算下来单次价格38元,折合我两顿饭钱。我最终办了一张500元的理发卡,考虑到我目前的住处租期为一年,我打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理13次发,每二十多天定期去一次理发店,为此来来回回走两公里路。

然而上周末我就这么折腾了一趟,突然感觉自己办的好好像不是理发卡,是健身卡,我的痛苦远远没能结束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■ 投稿邮箱:dtwbzj@163.com